

女英自述



康克清 周月林 劉英 彭 嬌 黃 長 保 萬 饒 香 玉 鸞
 鄧 穎 超 郭 希 陽 賀 白 雲 吳 伯 到 賴 英 花
 周 俊 秀 周 蓮 鳳 周 俊 秀 周 蓮 鳳 周 俊 秀 周 蓮 鳳
 周 俊 秀 周 蓮 鳳 周 俊 秀 周 蓮 鳳 周 俊 秀 周 蓮 鳳



女英自述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女英自述》

江西省妇女联合会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市新魏路)

江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25万

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4,500

ISBN 7-210-00268-5/C·33 定价: 3.60元



一九三七年毛泽东与
贺子珍在凤凰山吴家窑。



一九八八年一月五日
康克清摄于北京。



刘 英、张闻天
一九五五年在北戴河边。



李珊一九五八年受勋时的照片。



一九三一年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以后在瑞金叶坪村合影。

前排：曾碧漪 彭儒

后排：康克清 钱希均

周月村 贺子珍



彭儒、陈正人一九三九年秋于延安。



李坚贞在广州。



曾 志摄于一九五五年。



钱希均摄于一九八一年夏。



李伯钊



曾碧漪
一九六五年在广州。



李桂英



胡德兰一九五四年
七月一日于南昌。



徐大妹



前排：郑莲凤 谢玉钦 危秀英
王泉媛 曾子贞 杨树兰（从右至左）
后排：饶玉鸾 周淑女 黄长娇
万 香 黄发桂（从右至左）

内 容 提 要

本书由30几位参加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女战士自述。她们之中，有世界知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妇女运动领袖蔡畅、邓颖超、康克清；有受人尊敬的贺子珍、曾志、刘英、李坚真、李贞……也有默默奉献的女英雄。每一篇自述，各具特色，反映了女英们光彩照人的革命情操、惊心动魄的战斗历程、情意缠绵的爱情生活。

本书文字生动，内容真实，情节曲折感人。有些内容还是第一次见诸于世，鲜为人知；署名均为真迹；书中的许多照片，绝大部分没有发表过。既是一本图文并茂，引人入胜的列传，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生动而珍贵的史料。

目 录

序	1	周淑女	124
贺子珍	1	李 珊	132
曾 志	18		
彭 儒	34	周月林	150
康克清	47	李坚真	162
		邓颖超	171
胡德兰	70	刘 英	178
缪 敏	78	钱希钧	202
徐大妹	85	李伯钊	214
杨树兰	92	曾碧漪	223
饶玉鸾	102	蔡 畅	235
郑莲凤	110	危秀英	254
李 贞	114	王泉媛	270

罗志才	279	李桂华	309
黄长娇	285	万 香	316
张士英	298		
李桂英	304	王 群	327
		应化群	333

贺子珍^①

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她的眼神是复杂的。在她与世隔绝多年，第一次接受采访时，那深沉的眼神里，曾掀起过一阵阵风暴。在人间所饱经的沧桑、快乐、幸福、孤寂和痛楚，血与火的洗礼，一齐在这深邃的目光中闪动。她发现自己过于激动了，便闭住嘴唇，竭力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让泪水流下来。稍后，她开始了这今生今世也难以忘怀的回忆——

1959年，正是桂花飘香的季节，我在阔别永新28年后，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

71年前，也是这样一个秋月朗朗的日子，我在这里出生，并在这里渡过了18个春秋。永新不但记录了我幸福的童年，而且也是我确立革命的人生道路的起点。我对永新怀着特别深厚的感情。这次旧地重游，既是为了重温旧日的记忆，另外还想

^①贺子珍（1910—1984）江西永新县人。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曾任国民党永新县党部妇女部长，是永新农民暴动的领导人之一，1927年夏上井冈山。历任湘赣边特委，红四军前委，中央军委以及中央办公厅秘书。建国后，曾在杭州市妇联工作。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看看，经过1/4世纪的永新变化有多大。

在县招待所安顿了住处，我迫不及待地独自走上变得宽阔平坦的大街，寻找那些过去熟悉的建筑：大革命时期的县党部、工会、农会及妇女会的旧址还在不在？如今都派了什么用场？还有井冈山革命时期建立起的苏维埃政府、以及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军委和召开过永新县联席会议的旧商会楼，是不是保留下来了？我发现，它们虽然更衰老，更陈旧，但居然还保留着。

我转入城南那条窄窄的石子路——南街，啊，我到了。就是这座三间门面宽的两层楼建筑。过去，我的父母在这里开过茶馆“海天春”，每天清早，父母亲把店面的门板全部取下来，招待四方客人。如今，这里门板紧上，门上挂着一把大锁。

乡亲们都不认得我，见我一身干部打扮，站在这里不走，便过来热情招呼我。他们告诉我，这里是县的豆腐房，工人都已经下班。他们得知我曾经在这里住过，主动把豆腐房的负责人找来，打开了门锁。

在我的记忆里，“海天春”的店面非常宽敞。如今站在里面，觉得它又窄又小。我往店的后面走去，穿过几步宽的小院，又是一栋同前面一模一样的三间门面宽的房子。这就是我过去的家了。我就是在这个小天地里长大，从这里开始观察世界、认识世界的。我一直记得这里是非常温暖光亮的，这次回来一看，却原来是那样阴暗潮湿。我没有多停留，转身走了出来。

我又去寻访青年时代的同室学友和一起并肩战斗过的朋友。可是我失望了。他们当中的多数人为革命牺牲，有的嫁了人，远走他乡。匆匆岁月，人去楼空，令人不胜惆怅。

那天晚上，我彻夜难眠，一根烟接一根烟地抽着。当年的

事情象过电影一样，在脑子里翻腾。

我的确有个温暖的家。父亲贺焕文是个憨厚老实的读书人，当过安福县的县长。因为替穷人讲了几句好话，办了点好事，被革职。他回永新后，在县衙门当了个“刑门师爷”，替打官司的老百姓写状子。妈妈杜秀，是广东梅县人，读过诗书，人长得特别漂亮。祖父在老家万年黄竹岭，留下一些田山和房屋。这样的家境，在当时的永新，可以说是上等的了，可是仍然无法躲过军阀和土豪的魔爪。

在我4岁那年，父亲被一场官司牵连进去。县衙门本来就对父亲的为人有意见，借此将他关押起来。母亲变卖家产营救父亲，等到父亲出狱，家里也破产了。为了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父母设法凑了点钱，租了一个铺子，开起茶馆来。

可是开茶馆的日子也不好过。军阀和土豪勾结，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地痞丘八，不仅自吃白喝，有的还借酒胡闹，调戏我的母亲。我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常常为这种事情生气。我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的事太多，不把社会翻个个儿，人民没法活。

这时我已经上了福音堂办的女学。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遍了中国，也传到永新，共产主义学说的传播，使永新一批激进青年热血沸腾。欧阳洛等到南昌求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了在永新县传播共产主义思想的火种。他们把一批革命书籍寄回永新，我由此找到了打倒军阀和土豪劣绅、解放穷苦人民的道路。

1926年4月，欧阳洛等回永新建党建团，我是他们发展的第一批共青团员，不久又转为共产党员。

这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大革命进

入高潮。8月，北伐军到达湖南茶陵。欧阳洛等人赶去，请北伐军开进永新。9月，北伐军来到永新。在北伐军的支持下，永新成立了以共产党、国民党左派为领导的民主政权，成立了国民党永新县党部。我按照党的指示，以共产党员、国民党员的双重身份，参加县党部的领导工作。被任命为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青团的县委副书记。我是永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妇女部长。

那时候，我才16岁，一面读书，一面工作。经常下乡宣传反封建、反迷信，还为巩固民主政权筹粮筹款。1927年4月，永新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临时县委，我和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都当选为县委委员。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这时我在吉安，担任国民党吉安县党部妇女部长和共产党吉安县委妇委书记。

6月，国民党右派勾结土匪武装，突然袭击永新，把正在农会开会的共产党员、积极分子全部投入监狱，县党部和各民众团体被捣毁，工农武装的枪支被收缴，贺敏学也被捕了。从永新逃出虎口的共产党员，陆续来到吉安。我们讨论了“六·九”事变的原因和后果，怎么也想不通，好端端的革命怎么一下子就失败了。有的同志说，只怪我们缺乏斗争经验，没有杀一批右派头目，结果他们翻过身来把我们整垮了。现在看来，这不是永新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陈独秀在中央推行一条右倾投降路线，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步步进逼面前，采取退让的政策，致使全国的反动势力来了一次大反扑。这是全局性的问题，不是永新一个县的共产党组织所能抵挡得住的。

我们不甘心革命就这样完了。大家商量的两个对策：一是

起草一份革命宣言，揭露国民党右派反对革命的罪行，由欧阳洛等带着赴南昌伪省政府请愿，要求清查反革命事变，二是联络附近几个县的工农武装，联合攻打永新，救出监狱的同志。当时联络的农民武装有袁文才、王佐领导的宁冈农民自卫军，原北伐军营长王新亚率领的安福农民自卫军和杨良善率领的莲花县农民自卫军。约请他们在指定时间，从三路起兵围攻永新。这就是1927年的永新暴动。

事情布置安排好了，我从吉安出发足足走了3天才到永新。永新已经被攻下，监狱里的同志全部脱险。但此时敌人从江西、湖南调来6个团，正向安福、莲花、永新扑来，并占领了这些县的大部分地区。三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知道，要守住永新城是不可能的，于是决定打一仗后撤出永新。

在这次战斗中，我的任务是带领一支赤卫队守卫永新南门。全队几十人，只有3支步枪，其余都是临时赶造出来的梭镖。我带领队员挑土运砖，修整城墙，还让队员们往城墙上搬大石头，动员儿童团准备铁桶和鞭炮。

向永新扑来的是湖南开来的一个特务营。埋伏在东西两侧的自卫军，故意把敌人放进南门处，安福的自卫军则偷袭敌人的老巢。敌人来到南门下，架云梯攻城。十几架云梯搭到城墙上。敌人喊叫着往上爬，我等他们的爪子快要伸到城楼上时，猛地喊一声：“打！”队员们有的举枪射击，有的使劲往外掀云梯，有的举起梭镖猛刺敌人的脑袋。有几架云梯离墙头还有一段距离，队员们就搬起石头往下砸。一时间，梯上的敌人全摔下去，城下一片鬼哭狼嚎。

敌人接着又组织了第二次进攻。他们重新架起云梯，一面打枪一面往上爬。我看到离自己最近的云梯下，站着一个指挥官，用枪逼着喽罗们往上爬。就对准这个家伙开了一枪，他应

声倒下。敌人慌乱起来，另一个小头目跑过来，继续逼迫敌兵往上爬。我对准他又是一枪。他也倒下了。当赤卫队员第二次把云梯掀倒时，南乡的农民自卫军点起土炮，儿童团在空铁桶里点响鞭炮；从敌人营地方向也传来激烈的枪声，偷袭得手了。敌人腹背受击，无心再战，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

这次战斗共消灭敌人百余名，缴获1百多支枪。我两枪撂倒两个敌人的事很快传开了，而且越传越神。说我是双枪女将，百发百中。其实，这些说法都不是事实哟！我的枪法并不好，打单枪都很勉强，怎么会打双枪呢？当年在永新城头打死两个敌人，有很大的偶然性，那是形势逼出来的，哪里是什么神枪手。

战斗结束的当晚，我和永新的党员们跟着袁文才、王佐的队伍上了井冈山。

我成为井冈山第一个女战士。上山后的2个多月中，敌人先后3次进山“围剿”。敌人来时，我们就分散打埋伏，同敌人兜圈子钻山头，整日露宿在山里，遇到敌人追得紧，找不到机会做饭，就饿着肚子跟敌人周旋。

在敌人第三次进山“围剿”时，我得了疟疾，打起摆子来。山上弄不到治疟疾的药，我只能咬紧牙关硬挺着。我躺在茅草堆里，发起热来，难受极了，但比起发冷来，还算好过。我们上山，都没有带被子，虽说这时是八九月，但高山上的夜半，仍然寒气逼人。我不住地全身发抖，上下牙齿碰得格格响。真想有条大棉被盖在身上才好，可是哪里来的大棉被呢？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给儿子带了一条小薄被，看我冷得难受，就盖在我身上，让儿子冻着。就这样也驱散不了打心里发出来的寒冷。

敌人不来骚扰的日子，我就住在茅坪。我的住处同袁文才家是门对门，可我很少住在那里，我常常同谢梅香住在一起，我喜欢同她睡在一张大床上，两人好说话。平时除了读读书，帮助谢梅香做些家务外，还跟着袁文才的练兵教员学打枪。

在这段困难时期，我和上山避难的战友们的心仍然向往革命，向往党。虽然大家心里却很着急，不知今后革命的路怎么走，可是谁也不说丧气话。我们觉得，革命高潮总有一天会到来的。

我们完全没有料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就在这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队伍到了耒市。经过两次谈判，袁文才、王佐决定请毛泽东上山，共商大计。

那天，永新、莲花、遂川的党员和袁文才、王佐一早就到步云山，迎接毛泽东。我打摆子还没有完全好，也跟去了。毛泽东只带了五六个革命军主要领导干部朝步云山走来。毛泽东穿的是一身破旧的灰布中山服，同其他几个一样，脖子上系了一条红色识别带。毛泽东个头很高，很消瘦，颧骨都突出来了。头发从中间向两边分开，比较长，皮肤晒得很黑，神色上还留有经过激战后没有恢复的疲劳，但是一双眼睛很有神，显示出他的睿智、温和与毅力。他的脚走路有点不得劲。那是因为长途行军磨伤化脓了。双方互相介绍，当袁文才领着毛泽东来到我面前时，他有些惊讶了，他没有料到，在井冈山的“头面人物”中，竟然有一个年轻姑娘。袁文才介绍说：

“她是永新的干部，叫贺子珍。”

毛泽东的疑团顿释，他爽朗地笑起来说：

“我还以为她是你的女儿，或者是哪位同志的家属呢！”他握住我的手说：“很好，很好，今后我们共同战斗吧！”

毛泽东起初住在步云山。步云山离茅坪不远，步行半小时